為保持高水準的電力輸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快向化石燃料過渡的步伐，進一步延續碳密集型發展道路。電力工業的加速發展使電力供應的增長速度超過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速度，導致資源枯竭及環境惡化問題。

結論部份，作者指出在長期戰爭與革命中形成的中國電力工業脫胎於「戰時」體制，這種體制雖然能夠在缺乏資金的條件下獲得快速發展，卻不可避免地落入低效率的困境。同時，過分依賴化石燃料的中國電力工業也深陷碳密集型發展模式的泥沼，而這亦為如今的環境困境埋下伏筆。面對諸多環境困境的大陸與臺灣，即使在能源轉型的道路上仍面臨諸多阻礙，前者雖有調動大量人力和資本以增加新能源利用的能力，但這種自上而下的調配方式卻導致產能過剩的後果。而後者在推進核能議程時則不得不面對民眾普遍的質疑。

本書論述1882-1955年中國電力工業發展的軌跡，但卻並未局限於電力工業本身。作者將電力工業的發展置於近代中國發展的脈絡之中進行動態考察，正因於此，電力工業成為各種勢力相互博弈的場域，更與國家建構、民族主義聯繫甚密。不過，作者對近代中國電力工業的探討還有可以進一步挖掘的可能，比如，作為一種與民眾息息相關的能源，電力與普通民眾的關係如何？此外，作者在書中提及1949年以前中國的水電計劃，而對1949年後中央政府對水電的態度和計劃卻並未展開過多的探討，這一議題似有可以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艾梅、馮樂晨

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

龍聖，《從祖先記憶到地方傳說：湘西白帝天王敘事的形成與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277頁。

近年來，隨着「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興起，更多學人把民間信仰研究置於特定的區域或族群中加以考察，以圖找到這種特定的文化現象背後，區域社會變遷以及互動的內在機制和動力因素，繼而在這種變遷與互動中書寫歷史的連續性。為此，民間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田野調查，不失為研究的有效路徑。龍聖所著《從祖先記憶到地方傳說：湘西白帝天王敘事的形成與變遷》（以下簡稱《白帝天王》）一書除緒論、結論和附錄外，主體共計五個

部份，該書正是作者在文獻梳理和田野調查相結合的基礎之上的成果。作者力圖在釐清白帝天王敘事演變與流動的巴人、楊氏等族群之間的關係的基礎之上，把握湘西在區域社會變遷中和王朝國家之間的互動，進而在「邊緣」社會日益整合進王朝國家的過程中達致對中國整體歷史進程的闡釋。

此書從族群互動與文化交融的視角入手，去追述白帝天王信仰的建構過程。在白帝天王信仰的起源問題上，作者承襲潘光旦先生的看法，把其源頭追溯到廩君巴人。在第二章中，作者以白帝天王的臉譜顏色和祭祀習俗為分析邏輯，論述後世湘西民間所崇拜的白帝天王源自於廩君巴人。作者在潘光旦先生基礎上的創新之處在於用三色臉譜所體現的等級結構，來說明白帝天王源於廩君巴人。即白色最高、紅色次之、黑色最低，分別代表廩君、廩君之族、四姓臣民不同等級的社會階層。其次，另外一個具有創新性的分析邏輯，在於回歸祭祀習俗本身，即「以人為祠」。作者指出白帝天王的祭祀承襲廩君巴人「以人為祠」的祭祀習俗，只是在後來的逐步演變過程中，變成以人血代替殺人的方式。因此，作者通過對廩君巴人和白帝天王的祭祀習俗加以比較分析，指出白帝天王信仰源於廩君巴人。與此同時，通過特定的族群發展變化，觀察民間信仰的發展變化，繼而追問信仰變遷與族群發展的內在邏輯，是民間信仰研究的有效路徑。此書研究的特色在於長時段地關注一個特定的族群，通過這個族群的流動與發展，把白帝天王信仰變遷置於流動的時空和場域中，繼而突破信仰作為一個靜態的、獨立的社會文化所在，形成其內在的族群邏輯。這最具說服力的表現就是楊氏族群變化中白帝天王信仰敘事的變遷，白帝天王源自廩君巴人，但是湘西民間流傳的白帝天王故事不是廩君五姓，而是楊姓故事。為此，在第三、四、五章中，將其置於楊氏家族的發展變化之中加以考察，梳理楊氏家族從北宋年間平蠻亂有功，楊氏三兄弟被朝廷敕封，到明代五寨令家楊氏以「漢將」後裔重構族群身份，再到清代楊氏一族家道中落與家族重建，這一長時段家族變遷過程中，白帝天王從「北地天王」，到「楊業的子孫」，再到「神龍之子」，實現家族敘事的變遷。

作者最為關注白帝天王信仰的起源與建構過程，在既有的研究中，對於這個過程中與廩君巴人的聯繫探討的相對較多，對楊氏家族的考量相對較少。而此書分析的特色之處在於進一步聯繫楊氏家族的基礎上，把這個過程回歸到兩個不同的族群文化系統，並在文化交融的視角中找到白帝天王信仰最終形成的獨特邏輯。作者從宏觀的兩個族群文化重疊和微觀的個體族群演變兩個方面，來闡釋白帝天王形成的複雜性和動態感。作者沒有局限於研究

特定的族群範圍和空間，而是立足於特定的族群，創造性地指出白帝天王信仰，是兩種不同文化系統重疊的產物，即湘西白帝天王信仰的臉譜和祭祀是源於廩君巴人，而白帝天王的故事和名稱則來自楊氏族群，它是由南下的廩君巴人和北上的靖州楊氏兩個族群體系所帶去的文化交融的結果。正是這種族群的流動和文化的重疊，才鑄成白帝天王信仰文化體系的獨特軌跡。

《白帝天王》研究的特色之處，在於長時段地聚焦於一個特定區域中的信仰對象，運用民俗學、人類學、宗教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展示這個特定的區域信仰背後，各種王朝制度的實踐，以及各種族群流動與關係的複雜面向。傳統湘西是一個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特定場域，自白帝天王傳入，到族群建構，直至被官方利用，在其實現地化的過程中，湘西社會的內在地方邏輯，以及其融入王朝國家體制的外在邏輯其實就已經產生。

在區域史視角下考察民間信仰，當然不可回避地方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問題，在作者看來湘西白帝天王是廩君巴人和楊氏家族兩種文化交融的產物，而這種文化交融的邏輯仲介便是朝廷對「邊緣」地區的開發，也就是說，白帝天王信仰的形成、演變與「邊緣」地區的開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此書關注王朝對「邊緣」地區的治理與開化，力圖展示白帝天王信仰變化背後「國家意識」存在的複雜面向。在第三章中，作者討論北宋元豐年間朝廷對誠州地區的開拓，以及楊氏土酋的歸附後，朝廷對楊氏兄弟的敕封問題；第四章中，作者以明王朝對五寨一帶的治理入手，論述在這一治理和社會秩序變化過程中楊氏家族的境遇與白帝天王信仰的變遷；第五章中，作者進一步討論在清王朝屯政政策的影響下，白帝天王神格的演變，以及在這一背景下楊氏族群的命運和白帝天王家族敘事的重構。這些都顯示出湘西作為當時「邊緣」社會的一個特定舞臺，其社會變遷，族群變化，以及白帝天王敘事變化，與國家的需要及其治理是緊密結合的。王朝對於「邊緣」社會的開化和管理方式，實際在「邊緣」社會又達到怎樣的效果，湘西楊氏族群變化以及白帝天王敘事變化都給予較為明確的答案。

「區域」可視為「國家」話語的具體表達形式，《白帝天王》立足於湘西地域白帝天王信仰的建構過程，在努力追溯這個漫長的信仰文化形成過程中所具有的地域性特點的同時，力圖弄清地域百姓的開化，以及百姓的正統性觀念，是如何在國家與地方的長期互動中形成的。因此，《白帝天王》關注朝廷的態度以及地方官員在治理過程中對白帝天王的運用。在第六章中作者討論王朝在招撫苗民和推行地方治理過程中，逐步對白帝天王的關注，諸多地方官員及士大夫階層力圖賦予其正統性的解釋，繼而白帝天王作為地方

神靈逐步進入國家祀典神的行列。而這背後所反映的其實就是「邊緣」社會被納入國家體制的過程，而地方官員對於其靈驗故事和來歷的塑造，某種程度上亦是對具有正統性的國家話語的表達。

更值得提及的是，在傳統的「邊緣」地區，王朝的制度進入過程中，對地方的「教化」，以及百姓對「國家意識」的接受，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就要求研究者要努力去追溯這個歷史過程。回歸到民間信仰，就要求把這種共時性的，具有思想結構特質的文化形式，建構成為一個具有歷時性的歷史過程。而白帝天王，一方面，它是跨越地理區域的民間信仰，而這裡作者的歷史連續性建構便回歸到族群的流動；另一方面，它在演化過程中逐步成為王朝的開化手段，因此成為地方與王朝互動的仲介，而這裡作者的歷史連續性建構便回到王朝的地方治理。也就是說作者的創造之處，在於運用這種具有區域性視角的雙軌分析邏輯，解釋這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把白帝天王作為物件，把流動的區域作為歷史舞臺，時間跨度從明清追溯到先秦，進而在長時段的特定時空中書寫歷史的連續性。

此書是作者回到歷史現場，在湘西進行實地田野調查和文獻收集工作基礎上的成果。為此，作者在收集到相關湘西民間文獻的過程中，也可瞭解到與白帝天王相關的傳說故事，進而進一步置身於湘西歷史文化環境中。作者沒有僅是簡單地歸納該地域的某些特點，而是深入探討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下，把具體的湘西地方文獻分析，與湘西實地調查結合，回到歷史現場，進而釐清湘西社會變遷狀況下，白帝天王信仰與楊氏族群等之間的內在聯繫。此書以各種官方文獻，相關考古發掘以及湘西地方、民間文獻為核心史料，輔以各種口述資料（民間傳說、訪談）、本地人的記述，以湘西白帝信仰及其基層社會變遷為獨特的地域邏輯，並分析其背後「國家意識」的存在，繼而探尋「邊緣」地區開化的進程。故在深入挖掘民間、地方文獻諸如族譜、碑刻、方志的同時，作者還廣泛運用《宋史》、《明實錄》、《清實錄》等官方文獻，以官方文獻為整體邏輯基礎，以解讀、運用民間文獻，進而闡釋其內在的邏輯聯繫。此外，此書有一突出特點就是關於民間文獻、口述資料的「最大價值」運用。無論是關於白帝天王源於廩君巴人的討論，還是白帝天王與楊氏家族之間的家族敘事，作者都充分運用民間文獻、民間傳說的史料性價值。例如作者運用楊氏族譜的重構過程，梳理其背後楊氏族群及其社會的變遷狀況，以族譜內容的創造，分析其反應的社會運行狀況和互動關係，及其背後所反映的地域聯繫。以及白帝天王相關的故事傳說中，作者特別多次提到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的「靈驗傳說」的存在，以此討論王朝

在地方治理過程中白帝天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與國家歷史所存在的某種密切的聯繫。與此同時，為弄清相關習俗狀況，作者還進行實地訪談，當然，在這裡作者未糾結於「口述資料」、民間傳說記述的「事實」性對錯，而是基於對這種百姓的歷史記憶的「最大價值」的解讀，去分析其所反應的現實社會關係和國家歷史的地域脈絡。

《白帝天王》梳理白帝天王廩君巴人以及楊氏族群將祖先從人到神的建構過程，也就是說作者把白帝天王的研究回歸到具體的地域社會中，深入關注族群的活動，而在這種行為背後作者書寫長時段的時間和空間中歷史的連續性。在這一過程中，作者找到國家歷史的影子，也就是這一建構過程中的地域社會變遷，以及後續中王朝對白帝天王的利用，與「邊緣」地區進入國家體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繼而作者完成從人到神和從地方到國家的歷史書寫。那麼回到另一個側面，即從神到人的價值關懷。白帝天王從人到神的建構過程，其實是族群祖先逐步成為精神化產物的過程。也就是說在廩君巴人以及後續的楊氏家族，甚至是相關地域民間的傳說的建構過程中，白帝天王由一種作為祖先崇拜的存在，成為一種地方精神文化的存在。而這種文化背後的核心和實質是什麼，或則說白帝天王作為一種文化的再創造，它反應的是倫理的、精神的底色，還是原本的祖先的崇拜，才能支持其跨越長時段的影響力和傳承力，這或許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作者從人到神的歷史追溯，還原歷史的連續性，而從神到人的關懷或許亦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與此同時，作者回歸族群，以湘西作為地域基礎，在分析和追述上突破區域的自然邊界，那麼回歸到自然邊界，作為跨越湘、鄂、川、黔四省邊界的白帝天王信仰是否具有區域的獨特軌跡，或許還值進一步考量。

王位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吳滔，《國史家事：〈致身錄〉與吳江黃溪史氏的命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303頁。

《國史家事》是吳滔教授繼《清代江南市鎮與農村關係的空間透視》（2010）、《嘉定縣事》（2014）、《垂虹問俗》（2018）等著作之後出版的又一明清江南研究新著。此書與前述著作略有不同。其一，《嘉定縣